

民族与民族学

杨堃 著

MINZUYUMINZUX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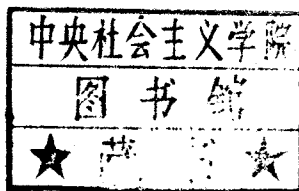
四川民族出版社

C912.5/3

58645

民族与民族学

杨 堃



责任编辑：李峰铭

封面设计：杨守年

民族与民族学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5 字数 215 千

1983 年 12 月第一版 198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700 册

书号：M3140·29

定价：1.81 元

自序

这本论文集的内容是我在1956年至1981年写成的。我在解放前的论文，概未收入。解放后我曾多次参加民族调查，写过调查报告并参加编写少数民族简志，但凡理论性不强，不属于争鸣性的文章，此次也未收入。我这本论文集的特点，是想为建设我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和个人看法。我学习民族学，已经五十多年。但最初三十多年，学的是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民族学。最近二十多年，才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民族学上的理论问题。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我是“半路出家”，是一个小学生。

本集内所收入的论文，几乎每篇都曾引起过争论。这些争论，有的是批评，有的是斗争，也有讽刺。但我基本上仍是坚持己见，没有见风使舵，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不过我主观上的原则，是否能符合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我却不敢自信。因此，我衷心欢迎同志们批评和指正。

大家知道，民族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它的许多基

本理论、基本概念和术语，还未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如不经过较长时期的争鸣和自由讨论，不经过时间的考验，那是很难得出正确结论的，也是不利于这门科学的发展的。我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如能引起国内外民族学工作者的兴趣，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些基本问题，如能为促进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那我就十分满意了。

每篇文章发表的时间虽不同，而我的学术观点却基本上前后一致，没有大的修改，故不免有极个别的地方前后重复。如为避免重复，而加以删削，就会有损文章的全貌。如果干脆抽掉，则理论的一贯性，系统性，便无法反映出来。我的有些看法，在最初发表时，却使许多编辑同志，不敢采用，仅能发表在地方性刊物上，不能和全国广大读者见面，因而流传未广。

有几篇初次发表时，曾写明和某些同志商榷。这次修改，却一律将名字删去了。因为商榷的是意见，而不是对人。

这本论文集内的论文，全是在1955年我有幸承周总理召见教诲之后，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才陆续写出的。本集中最后一篇，我的自传：民族学研究五十年，已作了自我介绍。若不是周总理这次召见，我可能写不出这本论文集来。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六年了。我不能在他生前献给他这本书，深感遗憾！在全国人民痛悼总理逝世六周年的日子里，我愿献出这本论文集，以表达我对他的崇高敬意和怀念！

目 录

自 序	1
回忆周总理对我进行民族学研究的教诲	1
什么是民族学	10
民俗学与民族学	46
神话与民族学	59
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	82
氏族——部落——部族——民族	124
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141
对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批判与继承问题	157
论人类学的发展趋势	
——如何建设新中国人类学体系	177
试论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学说	196
论人类起源学的几个问题	258
关于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史分期法的重新估价	285
试论原始社会史的分期法	300
原始社会史的分期问题	324
家族、婚姻发展史略说	342
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	
——试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资产阶级民族学的联 系和区别	366
我的民族学研究五十年	390

DI14/0/

回忆周总理对我进行 民族学研究的教诲

1955年春，周总理在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途中，路过昆明。我和我已故爱人张若名曾幸福地受到总理召见，聆听总理教诲达五小时之久，大部分时间谈的是有关国内外民族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总理知识渊博，洞察入微，对各门学科都有深切的了解。同时，总理平易近人，甚至对于象我们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也毫不嫌弃，耐心听取我的汇报，热情帮助，关心我们的政治进步，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送到我们的心坎上，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幸福。这五小时啊，是多么珍贵！给我们的深刻教育，使我们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二十年代，我在法国留学时，学的是资产阶级民族学。回国后，从事教学和研究，也完全是照搬外国的一套。直到解放后，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我才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不断有所提高，主动争取参加民族识别和民族调查，为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但是，由于旧的影响太深，在工作中还不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学术上也分不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线。所以，当总理问到国内

外民族学的情况时，我便兴致勃勃地谈了谈法国的情况，并将我在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的学习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总理当即指出，西方民族学所搞的那一套，无论是法国的或英国的、德国的或美国的，显然有一共同的特点，全是替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那么搞，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服务，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服务。

总理曾问到亚非各国的民族情况，并问我，世界上有多少民族？怎样分类？我说，大小民族约有两千个。一般有三种分类法：一种是按语言；一种是按生产特点；还有一种是按人类学特征。总理说，更重要的是按社会学来划分，从阶级观点来划分。人是分为阶级的，民族也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资产阶级民族学将世界上的民族分为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两类，它们专门研究野蛮民族，并抱有种族主义偏见。其实，一切文明民族全是从野蛮时期发展而来的。而现代，在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往往是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他们一旦得到解放和独立，也全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可以肯定的。

总理说，我们将来要发展民族学，对资产阶级民族学要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批判也不是全部否定。特别在民族学资料方面，我们仅在国内民族调查上做了点工作，将来还要大量地展开工作。至于国外的民族学和民族情况，我们就缺乏第一手材料；不参考他们的，是不行的。当然，我们将来也要开展对国外的民族调查研究。但在目前，我们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还缺乏了解，所以，不利用他们的资料，

是不行的。好在我们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可以进行分析和批判。这些资料虽有许多歪曲和偏见，但对我们还是有用的。你们在外国学过民族学的人，想为祖国贡献力量，这是好的。不过，仅有主观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努力学习，好好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有关政策，更要在实践中锻炼，逐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总理又说，你们在解放后，肯学习俄文，又肯学习苏联的民族学，这是好的。但也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便要犯错误。毛主席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就和苏联不同，因为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是发展的。我觉得这门学科很重要，我们要有大批的人，从事这项工作。

总理继续说，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有些民族，不仅居住在国内，也有一部分居住在国外。因此，我们的调查研究，就不能仅限于国内。我们现在还没有机会到国外去作调查，但国外的资料可以利用，譬如缅甸、印度、老挝、越南等等，过去全是英国或法国的殖民地，他们是作过许多调查的，并出有专刊和专著，我们应当拿来参考。另外，英国对于西藏的调查研究，法国对于云南的调查研究，他们全是别有用心的。但他们这方面的著作，我们也要拿来参考，必要时还要发表批判文章。我们和他们打交道，必须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我们对于这些外文著作、刊物，若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是要犯错误的。

总理询问，听说外国有些专门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他们将这种研究，叫做汉学。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我说，我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学习时，常去巴黎大学中国学研究所的图

书室。该研究所的所长叫葛兰言，他对于我国的古代社会、原始宗教、舞蹈、传说、节令、歌谣等等，有专门的著作，有的已有英译本和日译本。在解放前，在北平有一个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我也在该所担任过研究工作。他们所说的汉学，日本人叫作支那学，实际上，应译中国学。这是他们对于中国历史、语言、文化和国内诸民族的研究的一门学科。译成汉学，便将它的范围搞狭窄了。过去，他们的研究仅限于古代的。自从我国解放以后，他们的研究，又偏重于现代了。这些研究，说到底，全是替他们的对外政策服务的。但他们对于某些专题的研究，反而比我们强。国外对于中国学的研究，以法国为最有名，其次是日本。最近若干年，在美国、英国、德国、苏联、瑞典、荷兰，也全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在这些研究中，错误是极多的，但也有不少可供参考之处，如他们所出的工具书、字典、辞典、索引等，全可供参考。总理听了我的汇报之后说，我们既然要和他们打交道，便应该注意他们的这些研究，不能不闻不问。

我曾顺便向总理汇报，1949年云南尚未解放时，法国远东学院曾通过法国驻昆明的总领事馆，聘我为该院院报的通讯研究员，为期三年，除聘书外，还赠送我许多该院所出的书刊。在昆明解放前夕，法国总领事曾写信向我辞行，我未去送行，只将聘书退还给他了。总理笑着说，我们和法国的关系还比较好，将来总有建交的一天。一旦两国建交了，学术上的交往还是可取的。中法建交的时期可能不会太远了。

当我谈到民族学博物馆时，总理说，我在欧洲也参观过几个民族学博物馆，巴黎的、柏林的和英国的，我都参观过。我想了解一下各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然而，

我所看到的，却使我大失所望。他们全是宣扬殖民地、附属国各民族的落后面，从不展出这些民族反侵略斗争的英勇事迹；对于他们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也一概不提。我们将来也要建立民族学博物馆，就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有鲜明的阶级性。

在谈到对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评价时，总理指出，有人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当作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名著，那是不恰当的。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本书有过高度评价，但摩尔根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民族学家，是有神论者。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看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民族学著作。我们在读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时，最好能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一比较，这就可以看出，哪些论点是摩尔根的，哪些论点是恩格斯的。摩尔根的论点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恩格斯的论点，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今天来谈民族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仍是一本基本著作，需要好好学习。当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是发展的。我们有责任按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不能停留在七十年前的水平上。

总理又说，法国的拉法格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是马克思的女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他的《财产之起源与进化》一书，便是于1895年恩格斯七十五诞辰时，献给恩格斯的。我看，这部书也可算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著作。拉法格幼年生长在古巴，对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有实际的见闻。他还长期住在西班牙，对于法国和西班牙两国交界处的一种少数民族巴斯克族，作过调查研究。而且，他还

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神话学专家。

在谈到民族与宗教的关系时，总理说，怎样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使它能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是当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我在法国时，曾同几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作过论战和斗争。他们说，无所谓宗教。我说你们这样说，不行。宗教的存在，明明是一个事实。而且，从世界的人口来讲，相信宗教的人占绝对多数。无神论者，只是极少数。怎么能说它不存在呢？怎么能说“无所谓宗教”呢？而宗教问题往往又与民族问题有联系，所以我们的民族问题要认真研究，好好解决；我们的宗教问题，也要认真研究，好好解决。

我听完总理这段谈话之后，曾向总理汇报说，约在1922年或1923年当我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时，曾有人送我一本铅印的小册子，书名就是《无所谓宗教》。总理笑着说，我所说的无所谓宗教，就是指这一小册子说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便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和国民党右派，听说，他还将无政府主义信徒章桐等人，全拉到这个中法大学去了。我说，吴稚晖为人的作风，很不正派。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被我们赶跑了。

在谈到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时，总理说，这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民族问题学说的一大发展。沙皇俄国是少数民族的地狱，许多民族都是被强迫合并的，矛盾尖锐，反抗激烈；不提分立权，不足以激发各少数民族的革命热情，更不能消除民族隔阂，达到民族团结。我国的情况不同，我们历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是主要方面。而且，在近代，我们又是一个被压迫的国

家，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各民族都有利，不仅能行得通，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你们研究少数民族，一定要注意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为促进民族团结提供科学依据；不要死搬教条，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于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更要好好的体会。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对于毛主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和党的有关民族政策的文件，必须好好学习。

总理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我汇报曾参加民族识别和几次民族调查时，总理十分高兴，并加以鼓励说：到下面去好，要到实际生活中去了解少数民族的情况。上面资料并不多，下面什么都有了；否则，就成了抽象的研究。总理满怀深情地指出，要研究少数民族，就要同他们建立强烈的感情；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认真学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必须接受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遇到困难，及时汇报，请求协助解决。你们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特别要研究他们对伟大祖国的贡献。他们保卫了祖国的边疆，巩固了祖国的版图。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他们，后果是严重的。今天，我们不仅要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还要帮助他们提高文化。近年来，我们搞了一些民族调查，这只是一个开端；今后还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的调查。总理又问，你们搞民族识别，根据什么标准呢？我说，在大体上是根据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内所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为标准的。但对于某一具体民族（例如回族），须作具体分析，不要硬套公式。

总理又问，依你看，斯大林说的这四个特征，有无轻重之分？在这四个特征之中，能否说，哪一个特征居于主要地位？我想了一下，便回答说，我想“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应居于首要地位。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才形成共同的文化，由于长期生活在共同文化之中，才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所谓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团结的力量，等等，便全是这种共同心理素质的表现。而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则是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物质基础。至于共同语言，也属于共同文化的一个方面，因为，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和种族，没有必然的联系。总理说，这个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当时，总理关切地问我们读过《毛泽东选集》没有，我说已读过一遍，除个人自学以外，还参加集体讨论。总理笑着说，这很好！不过，对毛主席的著作，只读一遍是不行的，要经常学习，反复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改造和研究工作。到民族地区作调查，也要带着《毛选》随时学习。要有正确的观点，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为人民多做工作，多作贡献。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你受资产阶级民族学的影响比较深，要注意好好学习马列，学习《毛选》，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遇有机会还要多参加民族调查，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效果会大些。我们的好总理啊！真是语重心长，关怀入微，对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倾注了多么深厚的感情，寄予了多么殷切的希望。

总理对我们的谈话，从上午八点一直继续到下午一点，并留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可是，当我们辞别总理回到学校未过多久，总理紧接着又来到云南大学视察，对民族学研究工作又

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总理为国操劳，日理万机，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当时，总理正忙于出席万隆会议的准备工作，要务在身，还抽这么多时间，热切地关心并亲自询问民族学研究方面的工作。这说明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多么关怀兄弟民族，多么重视民族学的建设和发展啊！

然而，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民族学研究工作的大好形势遭到破坏，竟使工作停顿达十多年之久，在我们的.心上压上了一块大石头。

今天，心上的石头被搬掉了，头上的乌云被驱散了，在阳光普照，冰雪消融的大好春光里，党中央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战斗号令，带领我们开始了新的长征。我虽已年过七旬，但仍感精神倍增，决心以有生之年，竭尽绵薄，为新中国的民族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以不辜负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关怀和希望。

什么是民族学

一、民族学的名称和对象

民族学是用实地调查方法研究民族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一般历史科学的研究资料全是档案和文献，而民族学的研究资料，则是现仍存在，可以直接观察和调查的各个民族的生活特点与文化特点。所谓民族学调查方法，简单地讲，就是到民族地区，去作调查和研究所使用的各种方法。因此，民族学乃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历史科学。

惟民族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比较新的科学，关于它的译名和对象，还有许多人弄不清楚，故有一谈的必要。

1. 民族学的名称问题

第一，我们所说的民族学，还有人叫作人种学。比如最近，《学习译丛》1957年第2期，《思想学术动态》一栏内有一条消息，标题是《在美国举行的人种学和人类学第五次国际会议》。它所说的人种学，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学。本来民族学这门科学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民族学中，虽有各种不同的学派，然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种族主义或种族不平

等主义。故将资产阶级民族学叫作人种学，原是有理由的。而且这个译名据我所知，至少也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了^①。但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学，也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而不属于生物科学的范围。故在解放以前好久，已经有人觉得人种学这个译名不妥当了。关于这个译名问题，也曾发生过争论，然而毕竟是民族学这个新的译名，已经站稳脚了。自1928年起，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即设立了民族学组，自1935年起，就成立过中国民族学会，自1936年起，至1948年止，前“中山文化教育馆”还编印过《民族学研究集刊》共六期。而中国民族学会还在1944年12月间，出版过一册《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当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民族学这门新的科学是得不到正常发展的。然而在我国已经有了30年历史的这门科学，为什么在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反而不被重视，既没有自己的全国性的学术机构，也没有自己的定期刊物呢？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从今天来看，人种学乃是人类学内一个部门，它是专门研究人类种族的科学，而和民族学不同，故不应混为一谈。

第二，我们所说的民族学，还有人叫作人文学，如今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的语言学顾问格·彼·谢尔久琴柯教授所发表的一篇演说，题目是《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的人文和语言研究》。而这篇文章的中文译者，乃将民族学这个名称，译为人文学。故谢尔久琴柯教授所建议的，希望中国科学院能赶快成立一个民族学

^① 参看拙著，《民族学与人类学》，载前《国立北平大学学报》一卷四期，《文理专刊》，1—52页，北平，1935年3月出版。